

日本家庭研究动向及日中家庭研究课题^{*}

石原邦雄

Abstract: The articl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a nationwide investigation of family conducted by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Family Sociology while making a brief review and sum-up on the history and the recent pulse of family sociology in Japan. Besides, it also mad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f family studies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last decade.

一、日本家庭研究的历史及近年来的动向

日本的社会学研究大约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而专门的家庭社会学研究大概已有70余年。在日本社会学界,家庭研究与村落(农村)研究一起是最早开展实证研究的领域。论述介绍日本家庭社会学发展史的文章和报告已有不少,笔者1992年在杭州举行的“日中家庭研讨会”发表的论文,就是这一问题的专门报导。本文则是以上有关报告的总结和发展。本报告特别要强调的是日本家庭社会学研究发展的三个时期,把握家庭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转换。表1对各个时期进行了划分,并整理了不同时期的“基本视角”、“主要研究兴趣、热点”以及“主要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的特点”。

如表1所示,第一个时期为20世纪30—50年代,这个时期可称为日本家庭的研究。后两期是美国的研究动向,它对日本也产生了影响。

表1 日本社会学家家庭研究概观——70年的历程

时代 年代	I 30年代—	II 50年代中期—	III 80年代中期—
基本视角 (理论框架)	制度(论)	集团(论)	关系 个人、意识
主要兴趣和研究热点	家与村落 家与同族 家与户、家庭 家庭的民主化	角色结构 配偶选择 家庭周期 家庭变迁 (由直系家庭制向夫妇 家庭制转变)	两性关系(社会性别论) 生命历程研究 主观家庭(论) 家庭的多样化 包括亚洲在内的国际比较 家庭政策

* 本文是1999年11月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于成都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城乡家庭理论讨论会”上发表的报告的基础上改写的。

时代 年代	I 30 年代—	II 50 年代中期—	III 80 年代中期—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文献、个案研究、整体研究 农村(家庭)调查	结构性访谈法 自填式问卷法 官方统计数字的二次利用 统计学的处理与分析	访谈法 生命历程 话语分析 小组调查、期群分析 全国抽样调查数据

为应付家庭的个人化、价值观的多样化、少子老龄化、高学历化、终身学习社会化、由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大而产生的“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等日本社会的变化及多元化, 家庭社会学的研究课题开始把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改革与家庭研究结合起来, 开展“政策”性研究。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家庭社会学学会以学会的课题形式进行了全国家庭调查。下面对这次调查作一较详细的介绍。

二、第一次全国家庭调查的意义与概要

(一) 调查的意义与目的

如上所述, 随着日本家庭的变化, 家庭社会学的关注点与研究方法也发生了改变, 由研究者群体实施全国规模的调查, 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摆脱那种局部性“中等范围调查”的积累方式。以前的调查主要是一个或几个研究者申请并得到文部省的研究资助, 动员身边的学生(兼做教学课程中的调查实习)开展调查。这种调查是针对一些相对集中的题目或假设, 确定相应的调查项目, 收集有关数据。但是, 受资金和人员的制约, 这种调查的样本数有限, 只能限定在一定的地区, 对满足一定的年龄、性别等基本条件的对象进行调查。样本数大多在 100—500 左右。为了摆脱这种局面, 有关研究人员一方面要求进行详细的个案研究, 另一方面要求收集更大规模乃至全国规模的概率样本数据。我们进行的全国家庭调查(简称 NFR=National Family Research)就是满足后者的一种尝试。通过全国概率样本收集可信程度更高的数据, 可以说是这次全国家庭调查的第二个意义。第三就是定点观测家庭变化。以前要把握日本家庭的全国性变化过程, 只能利用或重新加工“国势调查”(总务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厚生省)等政策机构所公布的调查统计数据。如果研究者本身可以每隔 5 年或 10 年进行一次全国规模的调查, 那么就可以从研究的角度把握社会(家庭)的变化过程。在日本社会学界中, 以“数理社会学”为中心, 10 年进行一次被简称为 SSM 的“社会分层与社会变动调查研究”, 迄今已经进行了 4 次, 为阶层结构和职业流动的分析积累了成果。这项调查研究对我们这次进行的全国家庭调查起到了示范的作用。第四个意义在于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对这次全国家庭调查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 L. 班帕斯教授等人开展的 NSFH(全美家庭、家庭户调查)项目。他们在 1985 和 1986 年两年在美国全国抽出 10000 多个样本, 除了本人还对其配偶及一个子女进行了调查, 规模相当大, 而且在 5 年后对相对对象进行调查。受这项调查的影响, 欧洲也实施了类似的调查。这个项目的最大特点不在于课题组试图解决特定的研究课题, 而在于为满足更广泛的研究需求而尽可能地设定概括性的调查项目。调查结束后立刻将数据公

开, 提供给普通研究者利用。在美国, 由于信息公开政策的普及, 大约 20 年前就形成了将政府资助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在研究结束后提供给普通研究所利用的机制。在这个基础上, NSFH 项目作为一个领先的尝试, 就是收集公共的研究数据向研究者公开。在日本也可以通过因特网下载 NSFH 数据, 分析问卷数据。在利用数据的新方法日益普及的今天, 进行问卷数据分析层次上的国际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及必要性越来越大。1994 年, 我得到一个长期到威斯康星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 在那里直接向班帕斯教授等项目有关人士了解了 NSFH 调查的实施情况及数据公开事宜, 这对在日本实施的全国家庭调查起了很大的参考作用。我们的调查可以说是日本版的 NSFH。第五个意义就是通过问卷数据的公开, 推动研究方式的革新, 这一点前面已经有所涉及。集中投入较大的预算, 取得全国规模可以依赖的数据, 然后把它作为学会的公共财产, 提供给研究者自由利用。这种做法在日本还是少有的尝试。但是, 在研究领域国际化的今天, 各国间的数据共同利用日益普及, 数据公开是一种必然的潮流,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研究者的研究活动, 就是在研究生的论文写作与老师对其论文的指导方面也将发生大的变革。同时, 通过研究者的这种努力, 还可以要求政府在官方统计数据方面采取信息公开政策, 以接近美国、欧洲各国的公开水平。

(二) 调查设计

1. 调查对象的选定

这个调查是一项家庭调查, 但把调查对象定为个人。这可能是中国研究者还不很熟悉的方法, 但这个方法很值得注意。以往的家庭调查是把同居的亲族作为家庭, 大多以户为调查单位, 但是在流动性很高的现代社会, 有些时候同居并不一定就是形成家庭的依据。另一方面, 在“家庭的个人化”这种现象产生的同时, 每个人的自立程度和行为主体性增强, 由于每个人的意识与选择不同, 这一发展趋势表明“家庭”的存在方式将会发生变化。而把握这些变化的有效方法, 就是把个人作为调查单位, 在此基础上分析每个人所属(本人判断)的家庭关系。就是说, 这次调查在确认同居关系和生活共同性这些事实的同时, 还准备了调查对象本人认为谁和谁是“家人”的问题。我们试图从不同于同居亲族的角度重新认识另外形式的家庭。我们考虑今后每隔 5—10 年还要对调查对象进行同样的调查, 并且要在(出生)同期群体间进行变化动向的比较, 同时还有预算方面的制约, 最后以全体国民为调查整体抽出 1921—1970 年出生(调查当时为 28—77 岁)的男女调查对象约 1 万人。

2. 抽样

利用分层多段抽样法, 第一次抽样单位是把全国 47 个都道府县按城市的人口规模分为 4 个区抽出 152 个点, 第二次抽样单位是府县以下的行政单位; 市区町村下属的町丁目(街区), 共计抽出 532 个调查点(町丁目), 每个调查点抽出 20 个左右的样本(个人)。样本(个人)抽样的资料用的是市町村公所的居民基本登记册(部分地区用的是选举人名单), 然后用等距抽样法按性别和同期集群(以 5 年为一个单位分 10 档), 抽出样本计 10500 个。

3. 调查方法与调查成绩

调查方法使用的是问卷自填法, 即由调查员将统一印刷的问卷送到调查对象那里, 由调查对象自己填写, 调查员日后再去收回。

调查实施时间是 1998 年 1 月。回收率男性为 64.4%, 女性为 68.6%, 合计 66.5%。在大城市和低年龄层中的回收率低, 这与其他社会调查出现的问题相似。

4. 调查项目

这里不可能详细介绍问卷的构成,仅就问卷所涉及的内容作一介绍。问卷大致设立了9方面的问题:A 回答人属性;B 家庭户属性;C 配偶属性及夫妻关系;D 回答人的家庭意识及生活质量;E 子女属性及(回答人)与子女的关系;F 父母属性及与父母的关系;G 兄弟姐妹属性及与兄弟姐妹的关系;H 继父母的属性及与继父母的关系;I 其他亲属的属性及与的关系。调查项目参考了上述美国的NSFH调查和日本国内实施的其他一些有影响调查的项目,严格选择了128项比较性高、利用范围广的问题。

(三)调查准备与实施体制

1. 实施组织

日本家庭社会学(会员约550人)设立了全国家庭调查特别委员会,以此为核心号召全体会员参与这项活动,最后组成了全国家庭调查研究会(约80人),其中约20人组成干事会,根据研究会成员的兴趣分成调查设计、资金筹措、调查委托及调查公司的选定等几个小组,开始编写调查项目目录和选择候选项目的工作,然后又经过了试调查(关于夫妻关系及亲子关系的2项调查),最后进入编写问卷阶段。

调查资金主要是文部省科学研究资助,但为得到这项资助用了4年的时间。在调查实施的最后阶段还得到了其他资助团体的资金补贴。调查对象的抽样及调查的实施委托给了日本最大的民间调查公司。

2. 调查实施后的做法及目前情况

试调查的两项内容首先在研究会内提供给大家利用,对分析结果进行研讨,形成研究报告,现在已经把数据提供给设在东京大学和北海道大学的数据库,对外公开。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全国家庭调查数据的利用和公开所进行的尝试。

全国家庭调查的数据回收后,在清理数据上花费了莫大的时间和人力,调查结束9个多月后,数据分发给了NFR研究会全体成员,在对数据进行检验的同时开始数据分析。目前有9个小组在根据自己的课题进行分析,2000年夏天发表第一次报告书,将于2001年春天发表第二次报告书。然后整个数据将委托给上述两所大学,向社会公开。

三、日中家庭研究交流的开展及其课题

日中之间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交流,可以说是在福武直开拓的基础上以农村研究为中心发展扩大起来的。90年代初,青井和夫、柿崎京一等日中社会学的核心成员开始与中国社会学界正式开展共同研究,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可以说这开创了一个新时期。但是,从家庭研究来看,迄今为止,还仅是地区研究其中的一个内容。80年代,关西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家庭研究者上次武次、宫城宏等曾做过一些尝试,但没有留下具体的研究成果。1991年和1992年,在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下,森冈清美先生组织实施了“日中家庭研讨会”,应当说这是日中家庭研究者正式交流的开始。当时,双方各有10名左右的研究者发表了论文,进行了讨论。研讨会使日中家庭研究者了解了相互的家庭研究现状,为以后的日中合作打下了基础。我本人也参加了研究会,并发表了题为“日本家庭社会学的确立与发展”的论文。在研讨会上我结识了中国学者,特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沈崇麟研究员成为知己。在此基础上,我们这次进行了日中合作研究,实施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中国家庭调查。我认为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将在日中家庭研究交流史上画上浓重的一笔。在以沈崇麟研究员为首的中方课题组与日

方课题组密切协商的基础上设计和确定了调查项目,并实施了调查。作为第一项成果,沈崇麟等主编的《世纪之交的城乡家庭》一书,已于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次调查与前文介绍的日本全国家庭调查一样,它的基本视角就是以个人为调查单位,进而把握调查对象(认为其)所属的家庭关系。同时,该调查还尝试了通过使用相同调查项目的问卷,用相同的尺度去把握农村和城市的家庭。从这方面来看,尽管调查还有各种限度和制约,但可以说它一方面为把握中国家庭的现状和变化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向日中之间乃至与美国等国际间的比较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上面主要谈了方法论的问题,下面我想讲两三点理论性的问题。从中国家庭来说,最重要的课题是把握其变化的过程。在经济社会条件急速变化的情况下,首先代际之间在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出现代沟,在具体的职业选择、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问题上都需要进行调整。住房的分配和获得直接关系到生活形态,各种制约因素应当引起关注。其次,在代际间的分离与调整之后,就是夫妻间的问题。在利益兴趣和价值取向上,丈夫和妻子并不一定完全一致。在现实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当中,这一点可能通过离婚表现出来。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比中国早20年,尽管各自的社会条件有许多不同,但在日本所发生的变化过程与结果中,可以为把握今天中国家庭的变化提供有力的比较视角。

一般来说,随着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会出现“核心家庭化”现象,但有必要密切注意它伴随着怎样的生活关系变化与持续的又一现象。从日本与中国比较的观点看,日本特殊的性别角色分工体制的僵化与动摇,可以作为与中国大陆(乃至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相比较的另一极。同时最为重要的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条件变化当中,要研究维持生活水平向上的家庭策略机制,而且在把握变化的时候,确定变化的基础十分重要。日本实施“全国家庭调查”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此。另外,不仅因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对家庭的认识不同,就是在每个家庭和每个人那里,对“家庭”的认知范围、人们所意识和所期待的生活关系及生活功能是否与实际的行为及结果一致?他们所认识的“家庭”是否与研究者、调查者所认识的家庭一致?这些都需要做深入的研究。我认为,日中家庭比较研究的发展必将加深对两国家庭的认识,目前进行日中家庭比较研究的可行性越来越大。

作者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罗红光